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2006

伯纳德·拉克汉姆中国陶瓷文化艺术遗产 译介研究述评

彭利元, 黄子洋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作为一名对中国陶瓷文化艺术遗产颇有研究的英国著名学者, 伯纳德·拉克汉姆的相关贡献尚未引起国内学界足够关注。他对中国陶瓷的研究译介主要分为汉唐陶瓷、宋代陶瓷、明清陶瓷三个方面。拉克汉姆探讨了汉唐陶瓷材质和形态上的突破与文化内涵; 其宋代陶瓷研究则聚焦于高岭土、龙泉青瓷的技术创新以及滁州窑刮花工艺对西方陶瓷的影响; 其对明清陶瓷的研究最为深入, 主要探讨了这一时期瓷器的文化象征和社会背景, 揭示了陶瓷如何反映宗教、哲学思想以及社会价值观。梳理研究拉克汉姆对中国陶瓷文化艺术遗产的西传贡献, 为理解中国陶瓷文化在海外影响及传播提供独特视角, 对践行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伯纳德·拉克汉姆; 中国陶瓷文化艺术遗产; 海外传播; 汉唐陶瓷; 宋代陶瓷; 明清陶瓷
中图分类号: H315.9; J5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5)02-0051-07

An Overview of Bernard Rackham's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n Chinese Heritage of Ceramic Culture and Art

PENG Liyuan, HUANG Ziy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As a renowned British scholar with extensive research on Chinese heritage of ceramic culture and art, Bernard Rackham has not yet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 for his contributions, from the domestic academic community. His studies and translations on Chinese ceramics primarily focus on three areas: ceramics of the Han and Tang periods,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respectively. For the ceramics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Rackham explores the breakthrough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ceramic materials and forms. The study of Song Dynasty ceramics focuses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of kaolin and Longquan celadon and the influence of Chuzhou kiln scraping technology on Western ceramics. The most in-depth study is carried out on Ming and Qing ceramics, which explores the cultural symbols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ceramics during this period, and reveals how ceramics reflects religion, philosophical ideas and social values of China. Analyzing Rackham's role in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heritage of ceramic culture and art to the West offers a

收稿日期: 2024-11-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荀学英译传播与中国文化海外影响语境机制研究”(24BY094); 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20世纪上半叶中国陶瓷文化西传文献整理、翻译与研究”(CX2417)

作者简介: 彭利元, 男, 湖南隆回人, 湖南工业大学二级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翻译学、语境主义认识论、跨文化传播学、中华典籍外译传播。

unique perspective on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eramic culture. This exploration is also signific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Bernard Rackham; Chinese heritage of ceramic culture and art; overseas dissemination; ceramics of Han and Tang dynasties; ceramics of Song dynasty; ceramic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西方陶瓷学家对中国陶瓷的研究可追溯至18世纪。在此期间,一批杰出的西方陶瓷学家,如殷弘绪(Pè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卜士礼(Stephen W. Bushell, 1844—1908)、霍蒲孙(Robert Lockhart Hobson, 1872—1941)等,对中国陶瓷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并将中国陶瓷文化有效地传播至西方。近年来,中国学者对这些西方陶瓷学者的贡献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总结了他们在推动中国陶瓷向西方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4]。但学界对陶瓷学者伯纳德·拉克汉姆(Bernard Rackham, 1876—1964)在推动中国陶瓷西传方面的独特贡献却鲜少关注。截至目前,在中国知网上,关于拉克汉姆对中国陶瓷西传方面的贡献评介文献较少,尚无学者对其在中国陶瓷研究领域的贡献进行梳理归纳。为弥补这一遗憾,本文拟对拉克汉姆的中国陶瓷研究著述进行述评,以梳理总结拉克汉姆对中国陶瓷文化艺术遗产的主要译介与贡献。

一、拉克汉姆中国陶瓷文化译介概况

拉克汉姆毕业于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从1898年至1938年,供职于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长达40年之久,并于1924年至1938年间担任该馆馆长。自入职起,他就负责馆藏陶器、瓷器、玻璃藏品等分类编目工作,因而得以广泛接触世界各国的陶瓷藏品。这不仅为他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其在西方陶瓷研究领域声名鹊起。拉克汉姆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意大利马爵利卡陶瓷与坎特贝雷教堂彩色玻璃艺术。1937年,鉴于其杰出贡献,拉克汉姆被授予至尊巴斯勋章。这一荣誉进一步肯定了他在陶瓷研究领域的卓越地位。拉克汉姆还是英国东方陶瓷协会的创始成员之一,该协会的创立汇聚了包括乔治·尤摩弗帕勒斯(George

Eumorfopoulos, 1863—1939)、霍蒲孙(Robert Lockhart Hobson, 1872—1941)、拉斐尔(Oscar Raphael, 1874—1941)等在内的众多顶尖陶瓷学家与收藏家,代表了当时英国对中国陶瓷研究的最高水准。拉克汉姆不仅重视对中国瓷器历史文化的研究,还具备独到的艺术鉴赏力。他运用西方的研究视角,结合精湛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明清时期的陶瓷进行了科学、客观的评介,对唐宋时期陶瓷亦有涉猎,为后续的陶瓷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初的欧洲陶瓷界,中国陶瓷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学者,如乔治·尤摩弗帕勒斯、霍蒲孙、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1874—1934)、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等。这些学者的研究范围广泛,涵盖了从中国陶瓷从商周时期至明清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作为英国陶瓷学界的杰出代表之一,拉克汉姆同样也将目光投向了陶瓷的研究领域。

拉克汉姆对中国瓷器的研究贯穿了其整个学术生涯。依据中国陶瓷的历史朝代,他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对汉唐时期陶瓷的译介与研究;对宋代陶瓷特色与风貌的阐释与译介;对明清时期陶瓷文化的译介与深入研究。

拉克汉姆对中国陶瓷的研究著作具有综合性特征。早在1910年,他便编撰并出版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陶瓷目录《瓷器之书》^[5],首次将该博物馆所藏的瓷器全面且系统地呈现给西方公众。该目录涵盖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中收藏的世界各国瓷器,如中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与英国等瓷器。其中,对宋代至清代陶瓷的描述篇幅最多,且介绍深入详尽。1925年,拉克汉姆与欧洲顶级鉴藏圈鉴定大师、英国形式主义批评家、西方现代主义美术开山鼻祖罗杰·弗莱(Roger Fry, 1866—1934)等六位中国艺术杰出研究者共同撰写的《中国艺术》^[6]一书问世,

这是西方世界首部对中国艺术进行整体全面介绍的著作, 涵盖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各个领域, 包括绘画、雕塑、陶瓷、丝织、铜器、玉石、漆器等。拉克汉姆负责陶瓷章节的撰写, 该章节通过历史脉络的梳理与实物图片的展示, 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中国陶瓷的发展历程与辉煌成就, 对汉代陶器以及唐代至清代陶瓷器的研究尤为突出。相较于《瓷器之书》, 该书陶瓷内容在介绍和描述上更为深入, 且补充了对明清陶瓷的译介与研究。

《中国明清瓷器研究简述》^[7]系拉克汉姆在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1935—1936)上的发言稿, 后经整理发表于《皇家艺术学会杂志》。此专论堪称拉克汉姆明清陶瓷研究的扛鼎之作, 其涵盖了他研究明清两代陶瓷的主要成果, 深入剖析了中国陶瓷文化内涵, 探讨了文化视角下的中国陶瓷特征。此外, 拉克汉姆还发表了《女王陛下为印度德里新政府大楼购买的中国碗》(1916)^[8]、《中国陶器文献: 简要调查与回顾》(1917a)^[9]、《中国早期陶瓷新指南》(1917b)^[10]、《天目茶碗: 命名之起源》(1923)^[11]、《中国陶瓷——评〈中国晚期陶器〉》(1925)^[12]、《明朝初期青花瓷器》(1948)^[13]等一系列综述性文章、书评及书信等。其整体研究轨迹清晰反映出拉克汉姆对中国陶瓷的研究重心逐渐由早期的器物形态研究转向后期的陶瓷文化艺术层面的深入探讨。

作为英国著名陶瓷学家及东方陶瓷协会创始成员之一, 拉克汉姆在弘扬中国陶瓷文化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通过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瓷器的深入研究, 系统梳理了从汉唐至明清陶瓷发展的主要脉络与细节特征, 着重阐述了明清瓷器的发展历程及其独特价值。在20世纪上半叶, 中国陶瓷在西方社会成为备受追捧的奢侈品, 在此背景下, 拉克汉姆作为英国陶瓷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 其对中国陶瓷文化艺术的传播与译介工作成效显著, 贡献不容忽视。

二、对汉唐陶瓷的译介梳理

汉唐时期的陶器, 虽在精美细致程度上不及明清时期, 亦不如宋代陶瓷之丰富多样, 但此阶段却标志着中国陶瓷的发展与重要转折。相较于对单一陶器的分析, 对这一时期陶瓷发展的整体研究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拉克汉姆在研究后

期, 对中国陶瓷的关注点从陶瓷本身转向陶瓷文化艺术。这一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他对汉唐陶瓷的探讨, 主要聚焦于其技术特征与审美色彩, 并选取相应的陶瓷样本作为实证支持。这种结合史实与实物佐证的方法, 极大地增强了其观点的说服力, 并有效地将中国陶瓷文化艺术介绍给西方受众。

汉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在此期间, 陶瓷技术与艺术实现了飞跃式发展, 技术更为成熟, 形态更加多样, 色彩也更为丰富, 尤其在材料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拉克汉姆指出, 汉代陶瓷摒弃了常见的红陶或灰陶以及铅釉的使用, 转而采用高温瓷坯^{[6]29-30}。这一转变标志着“瓷”这一新型材料的出现, 与前代的“陶”有着本质区别。此外, 他在《中国早期陶瓷新指南》一文中也指出, 汉代是中国陶器艺术迈向成熟与精致的重要转折点^{[10]143}。在形态上, 拉克汉姆认为, 汉代以来的陶瓷形态要比前代更为优秀。北魏时期, 未经釉饰的灰色陶土塑像, 虽质朴无华, 却往往透露出瓷匠敏锐的观察力与捕捉事物本质的精湛技艺^{[6]30}。拉克汉姆在研究汉代陶器发展历程时, 采用了宏观视角, 将汉代视为中国陶瓷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通过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探究, 梳理出“陶”向“瓷”转变的关键技术。其发现为当时西方陶瓷界理解中国汉代陶瓷的发展提供了有力证据支持。在宏观层面的分析之外, 拉克汉姆还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这一时期陶瓷发展的微观层面, 通过对比汉代之后陶瓷的形态变化, 探讨了陶器器型的演进。拉克汉姆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 能够更为客观且全面地揭示汉代陶瓷发展的进程与成就, 进而使更多欧洲读者深刻认识到汉代陶瓷在中国陶瓷文化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20世纪欧洲对唐代陶瓷的了解相对有限。霍蒲孙认为, 唐代陶器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卜士礼则表示, 那些精美的唐代器物或许早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中; 然而幸运的是, 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惋惜, 因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们确实存在, 这便足矣。拉克汉姆认为, 唐代瓷器对后世瓷器的影响深远, 他援引大英博物馆中收藏的复制品“唐代瓷胎刻画彩釉花草陶制花瓶”为例, 指出该瓷瓶的风格不仅在明代后期的陶器中有所体

现,亦在中世纪波斯陶器及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哈夫纳陶瓷中有所反映。其中,釉料作为色彩载体,在黏土上刻描图案轮廓,使其在烧制过程中有效地固定在预设区域内,实现了色彩与图案的完美结合^{[6]31}。伯希和在对《中国艺术》的书评中,对拉克汉姆关于唐代瓷器的判断表示赞同,认为其论据推翻了前人对唐代瓷器先入为主的观念^[14]。

拉克汉姆对汉唐陶瓷的介绍相对简短,且研究深度不及宋、明、清陶瓷。这既受限于时代因素,即欧洲能够获取的早期中国陶瓷资料有限,且大部分实物均属宋、明、清三代;也受地理与语言差异的影响,导致其对汉唐陶瓷信息的了解更为困难。拉克汉姆结合中国史实与陶瓷实物,以有限的文献材料和陶瓷样本对中国各时期陶瓷的特点进行了客观讨论与解读。此外,他基于实物对中国陶瓷进行解读,对不同时代陶瓷的技术发展及风格转变的判断较为准确,显示出其对中国陶瓷整体把握的准确性。拉克汉姆对中国陶瓷史的译介研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陶瓷界对中国陶瓷文化艺术遗产的理解与认知。

三、对宋代陶瓷的译介梳理

宋代陶瓷的发展承继汉唐、开启明清,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此期间,工业、经济、文化等产业均得到显著发展,陶瓷业亦不例外。官窑、哥窑、钧窑、定窑、汝窑五大名窑至今仍备受珍视,龙泉青瓷的色泽更是独步天下,其刮花工艺甚至对欧洲陶瓷制造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引发争相模仿。拉克汉姆对宋代陶瓷十分重视,他摒弃了在明清陶瓷研究译介中采用的编年史研究顺序,转而依据具体窑厂和制作工艺逐一展开讨论,其研究主要聚焦于宋代高岭土、滁州窑刮花工艺的探究,旨在使读者更清晰地认识宋代陶瓷的进步与独特之处,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拉克汉姆认为,宋代陶瓷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关键在于其发现了高岭土的特性。他指出,高岭土经烧制并辅以人工处理后,能赋予瓷器玉器般的光泽美感^{[5]10}。这种白色半透明、类似于玉器的瓷器为后世的瓷器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是宋代瓷器与前代瓷器的主要区别。欧洲之所以重视这种白色半透明的特性,是因为在西方,这种特性已经被定义为瓷器应有的品质。拉克汉姆在

《中国明清瓷器研究简述》中补充道,最早的欧洲陶瓷被称为“半透明雪白物质”^{[7]426},这与宋代瓷器的特征相吻合。同样,《中国早期陶瓷新指南》也有相关表述:“西方认为半透明性是瓷器的首要特征”^{[10]143}。第一个将高岭土引入西方的学者是殷弘绪,他在1712年与1722年分别写给耶稣会的信中详述了景德镇烧制瓷器的方法(后分别称为《中国陶瓷见闻录》和《中国陶瓷见闻录补遗》)^[15]。其中第二封信将高岭土介绍到欧洲。拉克汉姆则在此基础上对宋代陶瓷器所使用的高岭土进行了历史溯源,尤其注重其特性与瓷器烧造效果的成因分析,进一步强调高岭土对中西方陶瓷业的重要程度。由此,不难理解为何西方陶瓷界对高岭土如此重视,并将宋代陶瓷置于极高地位。

除了白色半透明的瓷器之外,拉克汉姆还认为龙泉青瓷也具有开创性意义。这种青瓷最初模仿青玉制作,出口广泛,几乎遍布世界各地^{[5]9}。单色瓷是这一时代瓷器的主要特征,而到了明清,瓷器很快便发展成多色瓷器,如青花瓷、五彩、粉彩等。龙泉青瓷对明清陶瓷影响范围广泛,原因在于龙泉窑在明朝初年发生迁徙,部分窑工迁徙至滁州,使得青瓷的制作技艺在此地得以传承与发展,延续了约三百年之久^{[7]435}。拉克汉姆在探讨龙泉青瓷与滁州窑时,将两者之间的历史联系进行了系统串联,这从侧面反映出拉克汉姆对宋代陶瓷的研究在继续关注技术与审美层面的同时,已开始深入陶瓷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探究其发展的内在动因。

滁州窑在宋代就已颇负盛名,拉克汉姆着重描述该窑的“刮花”制作工艺,并与西方类似技法进行了对比。拉克汉姆指出,滁州窑所产的大型宋代陶瓷,在装饰技艺上广泛运用了雕刻、刻画等多种手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技法与近东及欧洲流行的刮擦陶瓷技法相似,其要点是先通过切割手法去除白色底釉层,露出下方较深的胎体,再整体覆盖一层无色或着色的釉料。滁州窑的瓷匠们先在胎体上施不透明的白色或棕色釉,在釉层未干时进行刻划。烧制时,釉料沿刻划线条与空间边缘积聚,形成厚重的波浪状纹理^{[6]33}。此技法不仅影响了欧洲陶瓷设计,还为明代瓷器设计提供了灵感,明代分离釉面的刻线法与浮雕法均与刮花工艺相似,均是在瓷表进行刻

划, 使釉料在烧制过程中自然形成各种釉面而不相干扰。

拉克汉姆对宋代陶瓷的介绍聚焦于对高岭土的作用与滁州窑工艺技法的探讨。其不按编年史顺序介绍, 而是针对某一特点进行讨论, 有助于聚焦研究视角。对高岭土的介绍揭示了欧洲重视宋代陶瓷的原因, 使更多西方大众了解了宋代陶瓷在中国及西方陶瓷中的地位, 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中国古代瓷器卓越品质的理解与认知。对滁州窑刮花技法的介绍则探讨了宋代陶瓷对欧洲陶瓷业的影响, 以及这一技法对中国后世陶瓷工艺的影响, 充分展示了宋代陶瓷工艺传播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

四、对明清陶瓷的译介梳理

拉克汉姆遵循编年史顺序, 对明清陶瓷的介绍与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他通过精选不同年代的陶瓷样本, 勾勒出明清陶瓷的发展脉络。同时, 拉克汉姆深入剖析明清陶瓷的时代背景, 将历史、地理、政治等多元因素融入陶瓷研究当中, 探究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并塑造明清陶瓷的发展重心与路径。他的研究并未局限于陶瓷器皿的表面形态, 而是深入陶瓷背后的文化土壤, 挖掘影响陶瓷发展的文化因素, 以期揭示明清陶瓷兴衰更替的深层原因。

在《瓷器之书》中, 拉克汉姆对 16 世纪明代宣德年间以来的瓷器进行了概述。他借助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藏品, 总结了宣德年间的历史背景与瓷器设计偏好。例如, 青花瓷碗绘有的树木图案(松树、桃树和竹子)象征长寿, 石榴则寓意多子多孙, 树干被巧妙地扭曲成“福”和“寿”两个汉字的形状, 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福气和长寿的崇尚。这一现象表明, 宣德年间道教思想盛行, 这一观点一直延续至嘉靖年间。拉克汉姆援引书中实例“嘉靖款花鸟青花瓷碗”加以佐证, 该碗上凤凰与竹林中小鸟的形象栩栩如生, 竹子象征着长寿, 碗底则标有“大明嘉靖年制”字样^{[5]15}。

拉克汉姆在《中国明清瓷器研究简述》中进一步补充了上述观点, 指出正德年间人们崇尚佛教, 嘉靖年间则偏爱道教。嘉靖年间, 长寿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福气, 这一观念在瓷器的装饰上得

到充分体现, 如老子和道教八仙的形象备受青睐。带有嘉靖标识的瓷器上, 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彩绘风格, 即用沾满深蓝色颜料的画笔在瓷器上作画, 被称为“佛头蓝”, 这得名于佛祖头发常被描绘成深蓝色的传统^{[7]429}。拉克汉姆通过对瓷器实例的细致描写, 概述了明代宣德、正德与嘉靖年间瓷器的流行风格与宗教偏好, 从而折射出中国古代宗教哲学文化的深刻内涵。这体现出其深入文化层面去理解陶瓷设计风格而非单纯分析图案本身的研究理念。拉克汉姆的研究侧面揭示出, 他对中国陶瓷的认知已超越器物本身, 深入到陶瓷背后所蕴含的中国传统图案的象征意义、中国古代哲学宗教思想及宗教人物等方面的探讨。另外, 拉克汉姆通过分析陶瓷器上的图案, 逆向推导出各朝代与宗教之间的关联, 这进一步体现了他对中国古代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深刻影响的认知, 且这种影响渗透至基层社会, 具体表现在陶瓷烧造与设计之中。这表明拉克汉姆在研究中国陶瓷文化时采用的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 融合了历史、宗教、政治等多个领域的知识。

此外, 拉克汉姆对明瓷彩绘技艺进行了详细描述, 并给予高度评价, 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瓷器史上, 明瓷色彩堪称顶尖。他列举了南肯辛顿素亭藏品中的瓷瓶和莱弗夫人艺术画廊里的彩绘瓷花瓶, 这些瓷器上的彩绘与釉料的比例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色彩饱满而不失和谐^{[6]34}。在《中国明清瓷器研究简述》中, 他对彩绘陶瓷做了进一步补充, 指出明宣德年间瓷器艺术达到了巅峰, 尤其是青花瓷更是精美绝伦。青花瓷中的小器皿(如小碗、小罐及书桌摆件)被视为珍品, 其上花鸟、小人物等图案被精细地加以描绘, 线条勾勒与间距掌握得恰到好处, 充分展现了中国画的精髓。这些瓷器采用了均匀的淡蓝色水洗工艺, 这正是明代青花画的独特之处, 与后来康熙时期青花瓷的渐变波浪式水洗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7]428-429}。

拉克汉姆对彩绘陶瓷的见解有力反驳了当时西方学界对彩绘瓷器的偏见。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西方陶瓷界, 一种较为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瓷器上的彩绘难以接受, 该观点常以明代某些质量不高的彩绘瓷器作为例证。拉克汉姆并未全盘肯定明代的彩绘技艺, 而是指出, 釉下彩彩绘工艺精湛, 这一技艺对画师水平要求极高, 如画师水平不足,

确实可能会导致部分明瓷彩绘审美品质有所下降。

拉克汉姆在研究明代陶瓷时,采用了背景文化与陶瓷实物样本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了明代陶瓷的彩绘艺术、器型特征,以及当时西方学界对明代陶瓷彩绘存在的误解。该方法能够更为清晰地揭示中国陶瓷背后的文化元素,并将其展现给西方读者,有助于他们深入理解中国瓷器上图案彩绘的真正内涵,而非仅仅停留在审美层面。在彩绘效果的讨论中,拉克汉姆驳斥了当时西方部分学者对明瓷彩绘断章取义的观点,认为这部分学者没有看到明瓷发展的全貌,而取劣品进行抨击,论断缺乏客观性与公正性。

对于清代陶瓷,拉克汉姆的观点与多数西方陶瓷学者相契合,均认为康熙年间是陶瓷业的发展与复兴时期。他强调,时代背景是推动陶瓷业发展的基础,康熙年间,叛乱得以平定,社会整体趋于和谐有序,为陶瓷业提供了发展土壤,使得各行各业均能有序生产和发展。这些有利条件推动了陶瓷史上的技术进步,使得能够生产制作出极为纯净的白色瓷坯,以及能完美附着于瓷坯表面、展现出深邃光泽的釉料;另外,釉下彩和釉上珐琅的绚丽多彩、生动活泼,为瓷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空间,使其能够创造出各种精美绝伦的瓷器作品。

拉克汉姆尤为重视清代康熙年间的器皿,特别是康熙蓝瓷与康熙五彩瓷。他对这两种色彩的瓷器评价颇高,指出钴蓝色是该时期品质最优的典范,其色调深沉而清澈明亮,为康熙时期所独有,相比之下,其他时期的蓝色釉则略显暗淡^{[5]25}。然而,对于清代其他时期的陶瓷器,他认为无论是在设计层面还是品质层面,较之明瓷均有退步,并且进一步指出,康熙年间之后的瓷器虽技艺精湛但略显浮华,其主要的吸引力在于浮于表面的色彩魅力,而缺乏深刻的情感内涵。不过他并未全盘否定清瓷的价值,对清瓷的色彩仍持肯定态度,认为康熙青花瓷、粉彩瓷、蛋壳薄瓷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形态上的不足^{[6]36}。

拉克汉姆在《中国明清瓷器研究简述》中对康熙陶瓷亦有所补充,指出单色釉技艺在康熙年间达到了巅峰,其工艺之精湛,足可与宋元时期相媲美。例如,康熙蓝瓷所展现的宝石蓝,鲜亮而富有生机,这得益于烧制过程中釉料未完全被瓷

胎吸收,颜料既覆盖于釉下,又渗入瓷胎,赋予其独特的色彩层次^{[7]436-437}。

雍正年间,瓷器色彩开始向粉红色釉与深红色釉转变,彩绘上则更偏向于完全的自然主义风格。另外,拉克汉姆指出,雍正年间瓷器开始模仿古器,一类模仿宋代瓷器的形态与色釉,另一类则模仿明末时期的五彩瓷器。

拉克汉姆进一步指出,乾隆年间是中国瓷器衰退的开始,其主要影响因素为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往来^{[5]28}。自17世纪以来,随着中西贸易的日益频繁,一种迎合欧洲审美的瓷器风格应运而生。这种融合了西方元素的瓷器风格,在整个17世纪广泛流传。这一风气虽在康熙年间有所遏制,但随后愈发流行。其结果是,到了乾隆末年,虽然瓷器制造技术达到了精湛的水平,但瓷器作品却缺乏优雅和美感。进入18世纪,随着清代为西方国家定制瓷器出口量的急剧增加,以及德国梅森肯德勒瓷器艺术的兴起,西方各国对中国瓷器的热衷程度开始减弱^{[6]38}。

道光年间,中国瓷器曾有过短暂的复兴,当时模仿了一些雍正时期的设计,在艺术表现上颇为成功,但陶瓷制作的整体水平则出现退步。

在探讨明清陶瓷时,拉克汉姆依据英国各大博物馆及收藏家的实物陶瓷,对明清陶瓷的特点进行了系统整理。他结合中国史实与实物,对明清各时期陶瓷的特点进行了深入讨论与解读,从而确保了论述的客观性。此外,拉克汉姆对明清陶瓷的阐释主要依托实物资料,并根据瓷器的不同风格特点进行分类断代,彰显出他对明清陶瓷整体脉络的精准把握。整体上,拉克汉姆运用背景文化与具体陶瓷样本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了上层建筑对陶瓷产业发展的影响。在描述清代陶瓷时,他把陶瓷业的兴衰与国力强弱、贸易状况联系起来。例如,在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康熙、雍正时期,陶瓷产业蓬勃发展,涌现出众多新瓷器品种与优质色釉。进入乾隆时期后,受国际贸易影响,西方陶瓷审美偏好反向作用于中国陶瓷业,尽管工艺水平依旧保持顶尖状态,但艺术表现力却有所减弱。及至道光后,受多种外来政治因素的叠加影响,清代陶瓷业开始步入衰落。拉克汉姆通过对清代陶瓷兴衰历程的细致梳理,不仅展现了陶瓷产业的发展脉络,还借由

陶瓷这一文化载体, 侧面反映了清代的历史变迁, 向西方读者传递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他对明清陶瓷史的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陶瓷界对中国陶瓷的深入理解与认识。

拉克汉姆在中国陶瓷文化艺术遗产的译介研究方面作出了显著贡献。相较于霍蒲孙、劳费尔、卜士礼等学者, 他撰写的有关中国陶瓷著作数量相对较少, 但每部作品及每篇专论均堪称精品。他不仅通过著书立说推进中国陶瓷文化艺术的传播, 更是通过积极参与陶瓷展会及研究协会的活动, 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陶瓷文化艺术遗产向西方的传播。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 拉克汉姆对中国陶瓷的译介研究仍存在某些局限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秉持客观态度,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 为该研究领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推动了中国陶瓷文化艺术遗产在西方世界的进一步传播。

参考文献:

- [1] 陈宁, 胡思琪. 文以典载, 走向世界: 中国陶瓷古籍海外传播现状评析[J]. 图书馆论坛, 2023, 43(10): 13-21.
- [2] 胡思琪, 陈宁. 中学西传, 瓷名远播: 19世纪以来中国陶瓷典籍西文译本的整理与研究[J]. 图书馆论坛, 2023, 43(10): 22-29.
- [3] 吴艳. 殷弘绪两封书信日译本: 《中国陶瓷见闻录》翻译方法研究[J]. 陶瓷研究, 2020, 35(4): 72-75.
- [4] 赵成清. 霍布森与20世纪上半叶明清陶瓷研究[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19(5): 56-60, 210.
- [5] RACKHAM B. A Book of Porcelain[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0.
- [6] FRY R, BINYON L, KENDRICK A F, et al. Chinese Art: An Introductory Handbook to Painting, Sculpture, Ceramics, Textiles, Bronzes & Minor Arts[M]. 3rd ed. London: Batsford, 1925.
- [7] RACKHAM B. Chinese Ceramics: Ming and Ch'ing[J].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 1936, 84(4345): 426-440.
- [8] RACKHAM B. A Chinese Bowl Purchased by H. M. the Queen for the New Government House, Delhi[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16, 28(156): 245-247.
- [9] RACKHAM B. The Literature of Chinese Pottery: A Brief Survey and Review[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17a, 30(167): 45-52.
- [10] RACKHAM B. "Early Chinese Pottery" a New Handbook: A Review[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17b, 31(175): 142-144, 147.
- [11] RACKHAM B. Temmoku Tea-Bowls: The Origin of the Name[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3, 43(247): 201.
- [12] RACKHAM B. Chinese Porcelain[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5, 46(267): 316-319.
- [13] BLUETT E, RACKHAM B, POULSEN V. Early Ming Blue-and-White[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48, 90(542): 149-150.
- [14] PELLISOT P. Review of Chinese Art, an Introductory Review of Painting, Ceramics, Textiles, Bronzes, Sculpture, Jade, Etc., by R. Fry, B. Rackham, L. Binyon, W. P. Yetts, A. F. Kendrick, O. Sirén, & W. W. Winkworth[J]. T'ong Pao, 1927, 1/2(25): 110-116.
- [15] 杜赫德.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中国回忆录: 上卷 II[M]. 吕一民, 沈坚, 郑德弟, 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87, 247.

责任编辑: 徐海燕